

规制俘获理论跨学科研究进展述评

李 健^{*}

摘要：规制俘获理论是刻画政府规制过程中各利益集团相互行为关系的理论，它将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及分析方法引入对政府规制目标和效果的研究，从而大大拓展了规制研究的视野。随着规制环境的变化，规制俘获理论研究呈现出跨学科、跨边界、跨层次的趋势，管理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与经济学中规制俘获理论的交叉、融合，发展了许多新的研究内容和领域。本文从规制俘获的前因、方式、结果和治理措施等方面对这些领域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和最新进展进行介绍，并结合现有各学科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提出为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关键词：规制俘获 交叉学科 理论研究

一、引言

规制俘获理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规制周期性、可预见性地被那些产业、专家、商人或其他利益集团或者官僚及立法机构控制。自斯蒂格勒(Stigler, 1971)首次将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引入规制研究并创立规制俘获理论以来，大批经济学家被吸引到政府规制理论的研究，规制俘获理论也成为规制理论中较为成熟的部分之一。近年来，其他相关学科也开始密切关注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过程和结果，这些研究与经济学中规制俘获理论的交叉、融合，发展出许多新的研究内容和领域，使规制俘获在交叉学科下的兴起成为规制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因此，梳理规制俘获理论的跨学科研究脉络，并合理借鉴与吸纳这些成果，可以为国内相关理论的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背景知识与研究立足点。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五个学科，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规制俘获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在综述过程中，我们尤其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各学科对规制俘获理论的研究角度和思路是怎样的？各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与现有经济学中俘获理论存在一致性或冲突？二是各学科对规制俘获理论的研究各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未来应如何综合这些特征以更好地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二、经济学对规制俘获理论的研究

经济学中规范的规制俘获理论是在对公共利益假说的批判中产生的。公共利益假说起源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该假说认为，规制是公众需要对市场行为进行纠正的反映。然而，在一些经验观察和对规制效率的实证检验中，人们发现规制并非完全有效(Posner, 1974)。20 世纪 70 年代，斯蒂格勒首先将规制因素内生化的，指出利益集团通过向规制者进行不透明的私人支付，以影响法律、政令和规章的形成。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为解释规制俘获问题提供了一条经济学的思路。之后，佩尔兹曼和贝克尔等学者丰富和拓展了斯蒂格勒的思想，形成了俘获理论初期的芝加哥学派阵营。几乎在同时，以克鲁格、塔洛克和麦克切斯尼等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提出了寻租理论，从利益集团寻租和规制者创租、抽租的角度解释规制俘获的形成。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图鲁兹学派的拉丰、梯若尔和马蒂蒙特等人将委托代理框架应用于规制分析，并从不对称信息、缺少承诺以及不完美规制者的多重约束角度解释规制俘获的必然性。总的来看，规制俘获理论在不断发展中经历了多范式的演进过程，对俘获理论的认识也不断得以深化。

^{*} 李健，哈尔滨商业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50081，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50001，电子信箱：cn.lijian@hit.edu.cn。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功能边界关键基础设施网间失效的连锁效应建模与仿真”(61074133)的资助。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而细致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在企业俘获政府行为方面,斯蒂格勒(Stigler,1971)认为,政治家、官僚或政党比较关心自己能否再次当选,因此企业要想成功地俘获执政党必须为规制者提供选票、政治捐献、基础服务以及就业率等形式的政治资源。Morton 和 Charles(1992)认为官僚只关心自身福利,企业需要通过提供物质上的激励(例如行贿)俘获规制者。Miller(1996)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约束,规制者要面临大量复杂性的技术问题,企业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支持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规制政策。Dal Bó(2006)指出被规制者为了达到影响公共政策的目的,还会制造“麻烦”,例如威胁规制者的生命安全或造成名誉损失,尤其是当规制者的工作稳定性脆弱时,这种威胁的力量更大。

在俘获的影响方面,经济学主要从财富转移和福利损失的角度进行定义和测量。斯蒂格勒和佩尔兹曼认为相比不进行规制而言,真正发生明显变化的不是受规制产业的产量和价格,而是财富在各利益相关集团之间的转移。至于哪个集团会从规制中受益、哪个受损,则取决于该利益集团在提供政治支持和物质利益方面的有效性。Harberger(1954)认为当对产量尽量规制而不对价格进行规制时,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为“哈伯格三角形”,他测算了1924-1928年美国73家制造业的总利润和总资本,发现制造业市场势力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还不到整个国民收入的0.1%。Tullock(1967)批评了Harberger的计算方法,认为哈伯格三角形没有包含全部垄断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企业为寻求垄断租金所造成的福利损失会与垄断利润相等,真正的垄断社会福利损失还应该包括垄断利润——即“塔洛克四边形”。Posner(1975)进一步对“塔洛克四边形”进行了模型化推理和实证检验,他发现在某些产业垄断的社会成本已经高达GNP的17%。

受研究方法所限,传统规制俘获理论并没有给出实质性的解决办法。随着信息约束、交易约束和政治约束的引入,图鲁兹学派提出运用激励机制设计来防范俘获。Laffont 和 Tirole(2001)总结了四种措施来抑制可能产生的规制俘获:(1)防止规制者滥用自由裁量权;(2)强化对规制者的问责;(3)提高规制者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4)减少信息不对称。其中,前两种方法旨在减少规制者被俘获的收益,后两种方法的目的是使双方合谋变得困难(倪子靖,2008)。

经历了数十年的理论变革和扬弃,规制俘获理论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它深刻地分析了规制失灵的原因,并从社会福利的角度阐述寻租的负面影响,不仅指出了俘获广泛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还为政府规制结构的设置、规制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但迄今为止,规制俘获理论依然存在严重缺陷:(1)该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设或对规制现实的经验性描述,尚未形成逻辑一贯、论证严谨的理论框架;(2)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主要关注影响市场的买者(规制需求方),图鲁兹学派主要关注影响市场的卖者(规制供给方),俘获供求双方的作用方式一直作为“黑箱”;(3)对俘获影响的考察局限于范围相对狭小的行业或企业,缺乏对俘获微观影响的直接估计;(4)由于许多假设条件背离现实,激励机制虽然在理论设计上近乎完美,但实践中越不易被广泛采用。

三、管理学对规制俘获理论的研究

传统管理理论把研究重点放在组织内部,政治环境被视为外生变量,是受企业行为约束的、“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但在实际研究中人们发现,企业常常会通过各种手段对政治环境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否发挥作用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及企业竞争力。20世纪末,一些学者在规制俘获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战略管理、企业行为理论和组织理论等管理理论,提出了企业政治行为(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企业政治战略(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ies)和企业政治关联(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等理论(Gets,1997;Baron,1997)。这些理论将规制俘获纳入一个可融入战略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描述企业政治行为决策与执行的全过程,进而探讨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成功路径。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1)什么因素或者争取什么方式,这些企业实施政治行为(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2)政治行为(政治联系)反过来影响企业绩效的程度。

经济学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认为所有企业都具有俘获政府的动机,但成功俘获政府的企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能力和数量限制;管理学则更多地从有限理性假设出发,认为单个企业既需要能力也需要意愿才会参与政治(Schuler and Rehbein,1997,1999)。其中,意愿被界定为影响单个企业对参与政治的收益估计的组织特征,能力被界定为影响企业参与政治的成本估计的组织特征。由于企业的意愿和能力会影响到企业对政治行为收益和成本的估计,管理学广泛讨论和研究了经济环境、政治环境、行业环境和热点事件等外部诱因,以及认知因素、组织结构、生产流程、经验和资源等内部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对进行政治行为预期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Boddewyn and Brewer,1994;Martin,1995)。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企业面临着跨国规制约束和新的国家标准,道德对企业政治行为形成的影响也得到了较多的讨论(Mattingly,2006;Mantere,et al.,

2009)。

在考察企业与政府的社会互动过程方面,管理学侧重于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企业政治行为,特别是:企业是如何影响政府的。也正因为如此,管理学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策略和方式的分析更为深刻。Hillman 和 Hitt (1999) 将企业政治行为划分为提供信息、财务刺激和选区建设(constituency building) 三种类型。Oliver 和 Holzinger(2008) 总结了西方国家企业影响政府的具体方式,包括游说和其他沟通关系的活动、竞选捐款、选民培养、公益性捐款、社会舆论、参加各种顾问委员会和提供国会证词以及提起法院诉讼和公开抗议等。由于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与欧美国家不同,田志龙等(2003) 探讨了中国企业的政治行为,认为现阶段我国企业主要通过直接参与、代言人、信息咨询、调动社会力量、制度创新、经营活动政治关联和财务刺激等策略影响政府。

由于企业政治行为相比俘获更普遍且容易观察,管理学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考察了企业政治行为与单个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相关性。多数经验性研究认为企业政治行为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增加企业价值,具体包括融资便利(Richter 2010)、税收优惠(Goldman and Rocholl 2009)、政府订单(Shleifer and Vishny, 1994) 和股票收益(Cooper and Gulen 2009) 等。但也有学者发现,把企业政治行为视为自变量时,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 Boubakri(2008) 以 14 个发达国家和 27 个发展中国家 245 家私营企业从 1980 年到 2002 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有现任或卸任政府官员担任董事的企业财务绩效较其他企业更差。Okhmatovski(2010) 研究了俄罗斯商业银行的政治关联,发现在政府官员的反向干预下,商业银行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的成本足以抵消政治关联带来的收益。由此,许多学者从承诺风险、控制风险、信息风险和治理风险等角度研究了企业政治行为的风险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关注。

管理学研究通过理论化企业政治战略的全过程,从企业的微观视角出发,不仅打破了经济学均衡分析忽视作用机制的黑箱,还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拓宽了规制俘获理论的研究领域,为我们深入了解企业影响政府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管理学仅从企业角度出发研究了企业如何影响政府,却忽略了政府视角,没能回答为什么政府会被企业俘获的问题。此外,目前关于企业政治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缺乏宏观层面的深层次分析,致使对企业政治行为的限度和约束问题缺乏关注。

四、法学对规制俘获理论的研究

政府总是强调规制的重要性,然而规制并非总是有效的。一些法学家很早就观察到行政机关在执行宽泛的立法指令时,常常会不公平地偏向有组织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受规制的或受保护的商业企业利益以及其他有组织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分散的、相对而言未经组织的利益。这种行为“不管其方式合法或非法,其取得的特殊利益部分都是非法的”,其结果会“彻底搞乱这个社会”(Sieyès, 1964)。传统公法与行政法侧重于事后分析的研究范式已经难以阐述有关产业与商业行为规制的一些关键问题。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规制的法律形式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视角重新审视规制,由此产生了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法律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law) 和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 等理论(Cooter and Ulen, 1988; Mally, 1990)。这些理论认为规制不仅依赖于科学的法律体系和执法机构体制,而且还依赖于有效的法律责任,只有联系不同经济组织及维持这些经济组织的法律形式的分析,才是了解规制问题的最佳途径(Ogus, 1994)。

在法学家眼中,俘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制法律的缺失。它一方面使规制者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造成规制者、管理者和股东的角色错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规制者的权威和威信难以树立,如果规制行为影响了某些垄断企业的利益,讨价还价的结果往往以规制机构的退让、折中来结束。这一结局的不断重复必然使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如果规制者自身的利益又与企业的经营活动直接相关,规制者被俘获就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白让让, 2004)。由此,治理规制俘获的内在要求是法律应该在能够控制规制权力行使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程序设计防范规制机构滥用自由裁量权。

在具体研究中,对规制俘获的治理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范式。一种是传统法学研究的视角,从社会公正角度研究俘获治理。Persson 和 Tabellini(1997) 指出,作为不完全契约,政治宪法无法避免权力的滥用。在民主社会中,选举是约束政府公共官员的基本机制,但却不够充分,立法和执法权力的分离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机制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形成利益冲突,从而使他们按照公共利益行事。Faure 和 Johnston(2008) 认为,规制权与司法权虽同属执行权,但司法权是判断权,而规制权是管理权。相对于行政权,司法权具有被动性,应将私人执法作为有效阻止规制俘获的重要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私人诉讼的损害赔偿标准、诉讼证据支持、集体诉讼等相关制度,发挥私人执法的积极作用。另一种是法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它侧重

于从社会效率角度治理俘获问题。根据犯罪惩罚理论,有效治理俘获的基本要求是俘获的预期成本应超过俘获的预期收益。Ainsworth(1993)认为,当不存在对游说活动的法律规制时,立法者可以通过增加利益集团活动的成本来限制其进行游说活动。唐要家(2009)提出,应该借鉴反垄断执法中的“宽大政策”,即在满足一些明确规定的条件下,如果企业完全或自愿地向法院提供有价值的关于政企合谋的证据,则对该企业的处罚可以被降低或被免除。“宽大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的背叛激励、降低惩罚的严厉性和增加企业之间的不信任,来成功地瓦解俘获。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法学对规制俘获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但它从法律和规制的关系出发,从更原始的层面分析和认识政府规制的原因和作用,为我们理解规制俘获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过于理论化,其方法论本身还存在很多争论,“若这种情况不能及时纠正,那么这个领域就更可能变得贫脊,而不能像那些数据和各种模型与理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那样得到发展”(秦海,2003)。

五、政治学对规制俘获理论的研究

政治学对规制俘获问题的研究比经济学更早,早在18世纪,一些政治学家就注意到有组织集团的倾向性以及这些利益集团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但这期间的研究是零星的、分散的。及至20世纪70年代,一批欧美的政治学者开始应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治过程,并逐渐形成了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特殊利益政治学(Persson,1998; Drazen,2000)。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规制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注定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目标。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开始由普通的“政治市场”(中间选民模型)假定转向更加现实的分析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吸取并深化了政治经济学、多元利益集团以及其他一些关注特别社会群体政治影响的标签(如“派系”、“阶层”或“精英”),并企图将行政决策的模型与市场机制的模型统一起来。

在政策制定者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问题上,政治学研究往往将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视为外生给定,以直接或代议民主的理想情形为参照,重点考察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Grossman和Helpman(2001)认为游说是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最主要的活动,它包括利益集团以提供建议、草案的方式直接与立法者接触,操纵媒体影响选民等。Spiller和Liao(2006)将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方式划分为:购买、游说和起诉。三者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通过间接方式进行。近年来,旋转门(revolving doors)现象作为商业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重要方式也受到广泛关注(Salant,1995)。张强(2008)分析了转轨时期我国特殊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的四种主要方式:利益捆绑,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理由要挟政府,通过权钱交易来贿赂官员,以及通过各种社会资源向政府施压。

在考察利益集团活动影响结果方面,当代政治学文献普遍强调使用数理模型,使结论更加严谨,但具体的研究结论却不一致。Olson(1965)认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分利活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造成“制度僵化”。Becker(1983)构建了一个压力集团竞争模型,认为像企业间的竞争会增进市场效率一样,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会增进政府的工作效率。Dixit和Londregan(1996)通过构建“摇摆选民”(swing voter)模型认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利弊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实力对比。如果立法者在政策安排中采用补偿捐献安排,某些利益集团的福利就可能增加,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李增刚,2004)。

为了抑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一个基本的思想是培养新社会阶层、新意见阶层、新社会组织和草根民众等新兴的利益集团,通过公民社会的崛起对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平衡和制约。然而,这种多元化民主也会由于利益组织化程度提高而对其成员利益和自治构成威胁——即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Dahl,1982)。Pande(2003)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委任政治代表(mandate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作为保障所有集团利益的制度。委任政治代表制通过保留弱势集团政治代表的名额,使其接受更多的目标转移支付(targeted transfer),从而增加了弱势集团获得的利益。

特殊利益集团政治学不仅是政治学的一个新方向,更是帮助理解规制俘获的新视角。它从消费者和企业的目标函数、可替代的市场均衡与资源配置的效果、规制政策与市场结果之间的关系等角度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进一步完善了规制俘获理论的内容。不足之处在于其假定利益集团之间总是存在利益冲突,却忽视了利益集团可能结盟的现实情况。此外,许多学者往往将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与发展视为最一般性的问题,缺乏对权力的经济基础以及权力的动态变迁过程的深入考察。

六、社会学对规制俘获理论的研究

社会学对规制俘获问题的研究是在对经济学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个体在从事经济

行为时,固然有自己的理性和偏好,但这种理性与偏好却是在一个动态的互动网络中做出决定的,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他们取代规制经济学分析中所采用的“均衡”、“租金”或“信息”等“大而无当”的语汇与臆测,将社会关系置于研究的核心位置(Granovetter,1973; White et al.,1976; Lin,1982)。围绕社会关系这一客观存在,社会学发展出社会交换、社会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等理论方法描述俘获行为。这些理论描述了一个竞争场域中的社会结构如何为企业带来机会,并由此影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从研究范式上看,社会学者主要从关系嵌入(relational approach)和结构嵌入(positional approach)两个角度研究俘获的形成与治理。

在关系嵌入范式中,企业实施政治行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改善企业绩效。Granovetter(1973)认为市场体制下,仅仅依靠价格机制的市场治理结构只能提供短期经济激励,但无法提供通过合作改善长期战略地位的激励和有效控制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企业不得不谋求规制俘获这种“制度性信任”模式作为非正式交换机制。Li(2011)也认为关系能通过将利益交换与社会交换嫁接以排除妨碍交易进行的法律、道德和认知障碍并将腐败参与者的交易安全风险、道德成本和认知失调最小化。在关系嵌入下,俘获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自我治理,它发挥作用需要相互影响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寄希望于最后的外部规制与法律仲裁。

在结构嵌入范式中,企业和政府被视为由社会结构诱发的行动媒介。张闯(2008)关于渠道结构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规制俘获的形成:网络中的权力分布是不平衡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种权力-依赖网络,在网络结构中处于权力弱势的企业可以通过俘获政府有效地改善其在网络中的地位,而企业俘获政府不是为了具有某些特征,而是要建立和维持其在网络中的结构优势。Burt(1995)采用“结构自主性”的概念描述这种结构优势的大小,“结构自治者自己一端没有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而在另一端有丰富的结构洞,这些玩家处于网络结构中的最佳位置,网络中的结构优势主要是为了获得控制利益”。结构嵌入范式下的社会学者认为关系网络建构的前提是权力的过份介入,而一旦这种权力丧失,网络中包含的社会资本就会大幅削减甚至完全贬值。因此,应该引入第三方机制对网络结构中的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

社会学对俘获影响的考察是通过局部网和全网分析进行的。Burt(1995)研究了以企业为中心的网络构成情况,他认为企业俘获政府意味着国家、社会和企业三元关系中出现了无连接或非等位的情形,而企业利用网络作为通路为其提供高结构自主性,享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关系被视为一种投资)。另一些学者则从全部社会关系的整体构型出发分析俘获的影响,但结论方面存在分歧。Granovetter(1973)认为当政府与集团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以平衡私人、产业以及国家利益时,总体经济表现以及分配公平性是可能同时达成的。Coughlan等(2001)认为网络对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有益但可能对于提升整体绩效并没有直接的益处。Han和Xi(2001)认为如果企业成功俘获政府,则意味着双方建立起“超级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超级关系”会损害社会经济中的平等、正义、公平的基础。

社会学研究为我们理解企业如何控制政府,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以达到更高层次的经济绩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视角,将经济学对规制俘获的描述性分析发展成为实证的演绎分析,是对规制俘获理论的巨大发展。目前,社会学理论的理论结构已经不止于大理论(grand theory)阶段,它的中层理论甚至理论模型都骤然具备,加上社会学又有着整套完整的数学工具,可以做精密详实的逻辑分析与假设检验,但是,比起技术或市场结构的数据,人际关系的数据比较难寻,导致社会学在解释俘获行为方面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七、研究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经济学意义上的规制俘获理论研究受限于单一学科视角,不仅无法解释很多社会经济现象,也始终无法说清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规制。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俘获产生的深层社会经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企业俘获政府,而有的企业不俘获政府?(2)企业俘获政府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如何理解不同企业俘获方式存在的差异?(3)企业俘获政府的结果如何?俘获给社会经济又带来了哪些影响?(4)如何进行规制体系的重新设计以防范和治理俘获?表1列出了不同学科研究范式的横向比较。

从表1中可以看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规制俘获问题时各有优长,这要求我们采用跨学科综合的视角对规制俘获理论进行研究,而跨学科研究在不断拓宽规制俘获领域的同时,也完善了规制俘获理论的知识体系,使我们对这种企业影响政府行为的形成原因、作用方式、影响结果和治理措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规制俘获现实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一背景下,规制俘获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为衡量规制俘获这一社会现象,以及评估和修正政府规制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方法。

表 1

规制俘获跨学科研究比较

学科	经济学	管理学	法学	政治学	社会学
理论	政治均衡理论; 寻租理论; 激励性规制理论	企业政治行为理论; 政治关联; 企业政治战略理论	法律的政治学分析; 法律经济学; 法经济学	利益集团理论; 特殊利益集团政治学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
前因	政治支持; 租金寻求; 信息约束; 缺乏承诺; 不完美的规制者	外部环境; 企业自身因素	规制法律的缺失	—	正式制度安排沟通不畅; 法律障碍; 道德障碍; 认知障碍, 网络权力分布差异
方式	政治捐献; 基础服务; 提供金钱或信息; 制造“麻烦”	游说; 竞选捐款; 选民培养; 公益性捐款; 社会舆论; 参加各种顾问委员会和提供国会证词; 提起诉讼, 公开抗议等	—	直接接触; 利用媒体; 操纵选民; 贿赂; 游说; 诉讼; 旋转门	直接接触; 利用社会网络; 企业的平衡运作
结果	财富由公众转移向产业; 社会福利损失; 租金耗散	缺乏宏观影响的研究; 微观影响的结论不一致	妨碍社会公正; 财富分配不合理; 效率低下	缺乏微观影响的研究; 宏观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有利于个体或局部效用; 整体效用结论不一致
治理	防止规制者滥用自由裁量权; 强化问责; 增加交易成本; 降低信息不对称	—	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分权和制衡; 发挥私人执法的作用; 增加利益集团成本; 减少俘获收益	通过多元化政治实现分散利益组织化; 委任政治代表制	—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跨学科研究虽然论述了经济学所忽视的一些问题,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预示着尽管受益于迄今为止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寻求一个综合性的规制俘获理论框架的探索尚未结束。

首先,不同学科的研究边界不同。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主动影响政府规制政策形成与制定的行为,不包括政策出台后企业被动反应的行为;管理学中更多的研究企业影响政策的“合法”方式;政治学不仅研究产业利益集团行为,还密切关注广泛存在的公共压力集团(包括劳动联盟、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团体)的活动;法学研究中政府对产业集团的“偏爱”也并不完全是俘获的结果;社会学的社会资本与寻租和俘获也有所区别。未来研究需要在跨学科动态发展中,不断修订学科间的界限,以推动规制俘获的研究边界由分异走向融合。

其次,不同学科的研究重点不同。经济学主要借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均衡、福利分析、组织机制等角度论述企业与政府的相互影响;管理学主要从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角度探讨企业影响政府政策的策略与方式;政治学主要从公共选择和规制的行政政策方面强调特殊利益集团活动对政治民主和社会福利的危害;法学研究的焦点是规制立法对规制机构行为的法律控制;社会学则更为关注异质性社会资本给网络个体带来的实际效用。这些学科往往过多地关注规制俘获问题的某一侧面,很少能够从整体角度出发去理解和分析俘获问题。因此,在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依然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再次,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经济学更多依赖纯数理模型对规制俘获进行规范性分析,缺乏有力的实证是该理论的重要缺陷;而其他学科在解释和预测俘获行为和过程时虽然广泛采用到实证分析,但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往往使研究者陷入自顾自地重复已有论断的矛盾与冲突。研究方法的失衡不仅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也容易造成研究过程的孤立与分割。因此,未来研究应该着力开发信度和效度俱佳、并且能够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研究方法。

最后,不同学科的研究结论不同。经济学从企业和政府的理性假设出发,认为规制俘获必然有利于政府和企业。跨学科研究使我们发现俘获的结果受外部环境、企业特质(如企业的能力、意愿等)以及策略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关于俘获结果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说法不一,有些针对相同变量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此,在进一步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俘获的宏观和微观影响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侧重点。

参考文献:

1. 白让让 2004《边缘性进入与二元管制放松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 李增刚 2004《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治过程》,《制度经济学研究》第4期,第241-250页。
3. 秦海 2003《法与经济学的起源和方法论》,《比较》第五辑,中信出版社。
4. 倪子靖 2008《规制俘获理论的变迁》,《制度经济学研究》第8期,第94-119页。
5. 唐要家 2009《反垄断与政府管制理论与政策研究新进展——“反垄断与政府管制:理论与政策”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第147-154页。
6. 田志龙、高勇强、卫武 2003《中国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研究》,《管理世界》第12期,第98-127页。
7. 张闯 2008《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渠道权力结构与策略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8. 张强 2008 《和谐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社会科学》第8期,第25-31页。
9. Ainsworth S. 1993. "Regulating Lobbyists and Interest Group Influe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5(1): 41-56.
10. Baron D. P. 1997. "Integrated Strategy, Trade Policy and Global Competitio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9(2): 145-169.
11. Becker G. 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98(8): 176-234.
12. Boddewyn J. J. and T. L. Brewer. 1994. "International - Business Political Behavior: New Theoretical Direct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1): 119-143.
13. Boubakri N. C. J. Claude and S. Walid. 2008.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 14(5): 654-673.
14. Burt S. Ronald. 1995.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 Cooper M. J. ,H. Gulen ,and A. V. Ovtchinnikov. 2010. "Corporat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and Stock Returns." *The Journal Finance* 65(2): 687-724.
16. Cooter R. D. and T. S. Ulen. 1988. *Law and Economics*.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7. Coughlan A. ,E. Anderson and L. Stern. 2001. *Marketing Channels* 6th ed. NJ: Prentice -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18. Dahl A. R. 1982.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Autonomy vs. Contro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 Dal Bó E. 2006. "Regulatory Capture: A Review."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2(2): 203-225.
20. Drazen A.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1. Dixit A. ,and J. Londregan. 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Success of Special Interests in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8(4): 1132-1155.
22. Faure M. G. ,and J. S. Johnston. 2008.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d." ILE Research Paper No. 08-07.
23. Gets K. A. 1997. "Research in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Integration and Assessment." *Business & Society* 36(1): 32-72.
24. Goldman E. ,J. Rocholl ,and J. So. 2009. "Do 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Affect Firm Valu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 22(6): 2331-2360.
25.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26.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2001.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Cambridge London: The MIT Press.
27. Han W. and Y. Xi. 2001. "Is Guanxi a Model of China's Business."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31(1): 43-47.
28. Harberger A. C. 1954. "Monopol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4(2): 7-87.
29. Hillman J. A. ,and M. A. Hitt. 1999.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 A Model of Approach ,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y Decis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4): 825-842.
30. Laffont J. J. and J. Tirole. 2001. *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1. Li L. 2011. "Performing Bribery in China - Guanxi - Practice ,Corruption with A Human F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20(68): 1-20.
32.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33. Malloy R. P. 1990. *Law and Economic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ory and Practice*. Salt Lake City: West Publishing Co.
34. Mantere S. ,K. Pajunen and J. A. Lamberg. 2009. "Vice and Virtues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The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usiness & Society* 48(1): 105-132.
35. Martin J. C. 1995. "Nature or Nurture? Sources of Firm Preference for National Health Refor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89(4): 898-913.
36. Mattingly E. J. 2006. "Radar Screens ,Astroturf ,and Dirty Work: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111(2): 193-221
37. Michael G. F. 2007.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d."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
38. Miller C. 1996. "Demographics and Spending for Public Education: Test of Interest Group Influenc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5(2): 175-185.
39. Morton R. ,and C. Charles. 1992. "Elections and the Theory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Firm Subsidies and the Byrd Amendment." *Economics and Politics* 4(1): 79-108.
40. Ogus A. I. 1994. *Regulation Legal Form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larendon Press.
41. Okhmatovskiy J. 2010.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Ties to the Government and SOES: A Politic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7(6): 1020-1047.
42. Oliver C. ,and I. Holzinger. 2008.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c Political Management: A Dynamic Capabilities Frame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3(2): 496-520.
43.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4. Pande R. 2003. "Can Mandate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crease Policy Influence for Disadvantaged Minoriti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4): 1132-1151.
45. Persson T. ,G. Roland ,and G. Tabellini. 1997. "Separation and Power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1163-1202.
46. Persson T. 1998. "Economic Policy and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The Economics Journal* 108(447): 310-327.
47. Posner A. R. 1974.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5(2): 335-358.
48. Posner A. R. 1975. "The Social Cost of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3): 807-828.
49. Rehbein K. and D. A. Schuler. 1999. "Testing the Firm as A Filter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Business & Society* 38(2): 144-166.
50. Richter K. B. 2009. "The Role Political Connections Play in Access to Finance: Evidence from Cross - Listing." Discussion Paper 2010/10 ,Richard Ivey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51. Salant D. 1995. "Behind the Revolving Door: A New View of Public Utility Regul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6(3): 362-377.
52. Schuler A. and D. K. Rehbein. 1997. "The Filtering Role of the Firm in Corporate Political Involvement." *Business & Society* , 36(2): 116-139.
53. Shleifer A. and R. W. Vishny. 1994. "Politicians and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4): 995-1025.

54. Sieyès J. E. 1964.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New York: Praeger.
55. Spiller P. and S. Liao. 2006. "Buy, Lobby or Sue: Interest Groups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Making – A Selective Survey." NBER Working Paper 12209.
56. Stigler G. J.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1) : 3 – 21.
56. Tullock G. 1967.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General & Introduction Economics* 5(3) : 224 – 232.
57. White H. C. ,S. A. Boorman ,and R. Breiger. 1976. "Social Structure from Multiple Networks. I. Blockmodels of Roles and Po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4) : 730 – 780.

Progresses of Inter – discipline Related to Regulatory Capture Theory

Li Jian^{1 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2: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Regulatory capture is a theory which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in government regulation , and it introduces economics theory and analysis method to the objectives and outcome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which greatly expands the view of regulation stud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y on regulatory capture is a kind of inter – disciplinary , cross – border , cross – level research , and then is a new energetic field developed by crossing and integrating the regulatory capture with many related disciplines such as management , law ,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in which the connotations , developments and new trends are expatiated.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refinements of these disciplines imply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being on the regulatory capture around antecedents , types , affect , and governance aspec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and shortcoming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 we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in further research for the principles of the integrity and ultimately develop 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theories.

Key Words: Regulatory Capture; Inter – discipline; Theory Research

JEL Classification: B250 ,K00 ,J51

(责任编辑: 彭爽)

(上接第 121 页)

10. Christev A. ,O. Kupets and H. Lehman. 2005.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Employment Effect in Ukraine."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826.
11. Forteza J. and M. Rama. 2006. "Labor Market Rigidity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Reforms Acros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9(1) : 75 – 105.
12. Gaston N. and D. Trefler. 1997. "The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the Canada – US Free Trade Agree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0(1) : 18 – 41.
13. Gourinchas P. 1999. "Exchange Rates Do Matter: French Job Reallocation and Exchange Rate Turbulence ,1984 – 1992."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3) : 1279 – 1316.
14. Hansen B. 1999.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 – 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 93(2) : 345 – 368.
15. Helpman E. ,O. Itzhoki and S. Redding. 2011. "Trad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NBER Working Papers 16662.
16. Kambourov G. 2009.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s and the Sectoral Reallocation of Workers: The Case of Trade Reform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4) : 1321 – 1358.
17. Konings J. ,O. Kupets and H. Lehman. 2003. "Gross Job Flows in Ukraine." *Economic of Transition* , 11(1) : 321 – 356.
18. Melitz M.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 – 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 71(4) : 1695 – 1725.
19. Wacziarg R. and J. Wallack. 2004.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sectoral Labor Mov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64(2) : 411 – 439.

Trade Growth Labor Market Rigidity and The Inter – industries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anel Data Threshold Effect Model

Yu Guansheng

(Business School ,We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o determine whether international trade can promote inter – industries labor transfer. However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have neglected the decisive rol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In this paper ,we build the indicators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and inter – industries labor transfer based on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use panel data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o research the diffident influence of trade growth on inter – industries labor transfer when there are diffidenc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Our research find that when the valu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is below the threshold value ,trade growth can accelerate the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between industries; when the valu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is above the threshold value ,trade growth will hinder the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between industries. So we can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if we want China's trade growth to promote inter – industries transfer ,we should first do reform in labor market and eliminate labor market rigidity.

Key Words: Trade Growth; Labor Market Rigidity; Inter – industries Labor Force Transfer; Threshold Effect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F16 ,J60

(责任编辑: 孙永平、陈永清)